

參、

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的大陸經驗： 「祖國意識」的形成、內涵及其轉變

一、前言

1895年滿清政府因甲午戰敗而將臺灣割讓給日本，這是臺灣近代歷史的轉捩點。從乙未割臺到1945年臺灣光復的51年之間，臺灣人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在所謂「內臺融合」的口號之下，飽受異族之凌虐，在臺灣人的精神世界中視中國大陸為祖國之所謂「祖國意識」在日據時代快速茁壯，許多臺灣知識份子內渡大陸，希冀圓其原鄉之夢。但是，許多臺灣人在一踏上「祖國」土地，就原鄉夢碎，自我疏離，尤其是歷經光復初期之「劫收」經驗而恍然覺醒。這一段「祖國意識」的形成及其轉變過程，是近代臺灣精神史的重要組成部份。

爲了探索近代臺灣人精神史上「祖國意識」的形成，釐清其內涵，分析其轉變之因素，本文將以下列三個問題爲中心，對這項課題展開探討：

(1) 日據時代臺灣人「祖國意識」因何而形成？

- (2) 日據時代臺灣人的「祖國意識」內涵如何？此種內涵及特質中潛藏何種問題？
- (3) 臺灣人的「祖國意識」轉變之關鍵何在？

本文除第一節交代全文旨趣之外，第二節探討第一個問題，第三節分析第二個問題，第四節研究第三個問題，第五節則綜合全文論點，提出結論性之看法。關於研究日據時代臺灣人精神史的資料為數甚多，類型不一，本文主要運用已出版之各種個人回憶錄、口述歷史記錄及日記等第一手史料，企圖窺探日據時代部分臺籍知識份子精神世界之一個突出面向。

二、日據時代臺灣人「祖國意識」的形成

自從明清時代以來，從福建、廣東等地移民臺灣的漢人，本來就將大陸視為「原鄉」，但是到了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以後，臺灣人的「祖國意識」之所以日趨強烈，有複雜的歷史背景，但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由於臺灣人身處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民族意識自然高漲，這是政治的原因；第二個原因則是由臺灣人的漢族文化的認同所激發的歷史文化意識，這是文化的因素。我們引用當時人所留下的第一手史料，論述以上這兩項論點。

(1) 關於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的民族意識起於日本人的壓迫這項事實，在當時的知識份子葉榮鐘、作家吳濁流、醫生兼作家吳新榮、當時在大陸經商的吳三連（1899-1988）等

人的經驗及其反省言論中都可得到印證。

在日據時代追隨臺灣大地主及著名士紳林獻堂的葉榮鐘，曾回憶他小時候經由長輩口中所獲得的對「唐山」（中國大陸）的「唐山山長長」的印象，以及他受到日本人的歧視所激起的感受，他說：¹

〔…〕我們的祖國觀念和民族意識，毋寧說是由日人歧視（當時叫做差別待遇）與欺凌壓迫激發出來的。他們的歧視使臺人明白所謂一視同仁的同化主義，完全是騙人的謊言，他們的欺凌壓迫，使我們對祖國發生強烈的向心力，正像小孩子被人欺負時會自然而然地哭叫母親一樣。

日人千方百計，想把臺人同化，其實真正同化，變成十足的日本人，他們也未必一定歡喜。他們只是要臺人忘卻祖國，而做比他們所謂「母國人」次一等的殖民就是了。

他們政府的政策和個人的行為完全背道而馳，但是他們的歧視和欺侮，無異給臺人的祖國觀念與民族意識的幼苗，灌輸最有效的化學肥料一樣，使它滋長茁壯而至於不可動搖。不過像我這樣在日本據臺以後出生的人，對於祖國只有漠然的觀念，因為它是手摸不到、腳踏不著

¹ 葉榮鐘：《小屋大車集》（臺中：中央書局，1977），頁24。

的存在，沒有切實的感覺。所以我們的內心深處常有一種期待，期待有朝一日能夠觸到祖國的實體。

葉榮鐘回憶他同時代的臺灣人所經歷過的心路歷程說，他這一代的臺灣人出生於割臺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山川，大陸上既無血族，亦無姻親。除文字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聯繫，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但是他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日據時代臺灣人觀念上的祖國，是由歷史文字而構成的。葉榮鐘回憶說，當他們抵抗日本人的壓迫時，日本人一句共同的恫喝就是「你們若不願意做日本國民，返回支那去好了。」由此日本人的壓迫力愈大，臺灣人孺慕祖國的感情也就愈真切。他認為，如果日本人在這 50 年的統治期間，能夠切切實實施行所謂「一視同仁」的政策，不歧視，不欺凌，則臺人的民族意識，或不致如此強烈。因為言語、文字、風俗，習慣以至於歷史文化，雖然也是民族的紐帶，但是最要緊的仍是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是否利害一致，機會均等。²

在葉榮鐘的回憶中，臺灣人的「祖國意識」是由日本人的殖民政策所激發的。這項觀察，也為日據時代臺灣作家吳濁流所肯定。吳濁流這樣回憶當時臺灣人的「祖國愛」：³

² 同上書，頁 212-213。

³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 40。

眼不能見的祖國愛，固然只是觀念，但是卻非常微妙，經常像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一樣，那父母是怎樣的父母，是不去計較的。只是以懷戀的心情愛慕著，而自以為只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過溫暖的生活。以一種近似本能的感情，愛戀著祖國，思慕著祖國。這種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過外族的統治的殖民地人民，是無法了解的吧。

日據時代臺南鹽水的醫生吳新榮在日據時代所寫的日記也可以印證葉榮鐘所說的「祖國愛」。正如許多臺灣知識份子一樣，身處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吳新榮，面對日本侵華戰爭，目睹日本帝國主義主義者對中國大陸的凌虐，心中油然而生對中國大陸的關懷。戰爭期間吳新榮的日記最能透露這種關懷之情。吳新榮面對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深感漢民族被瓜分的危機，他說當時的中國：「北京以王克敏為中心，組織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統治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各省。在綏遠，德王建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統轄內蒙古。再早，前清遺老鄭孝胥（蘇龕，1860-1938）成立『滿州帝國政府』，統治東三省。庫倫又自立『外蒙古共和國』。悲哉，我中華民國四分五裂，要不出現偉大人物，則我漢民族被強權瓜分，各自獨立，紛亂不已。」⁴這種對中國危機的感同身受，使吳新榮對當時

⁴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戰前）》（臺北：遠景出版社，1981），頁68。

的中國政治領袖寄以厚望。吳新榮在日記中說：「昨夜警笛鳴響，通報武漢陷落的消息，中國的心臟被攫奪。前此，腦袋部位的南京地方及兩手臂的北京與廣東地方已喪失，中國僅存的是甘陝、雲貴的兩腳，今後如何走下去？日本如同忽必烈，如同愛新覺羅，已征服中原，蔣介石（1887-1975）果如岳飛、鄭成功之意氣否？」⁵吳新榮期許蔣介石效法漢民族之英雄人物岳飛與鄭成功，他身在臺灣但關心的是大陸，例如 1947 年 12 月 21 日，吳新榮讀完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的《大地》（The Good Earth），對悲慘的中國農村與農民寄與無限同情，認為：「只有中國獨特的革命方式即可能救中國的複雜性」。⁶

日據時代臺灣人的「祖國意識」，主要是日本的殖民統治所激起的，出身臺中清水的楊肇嘉也肯定這項事實。他回憶日據時代的狀況說：「臺灣曾經出版過幾種中文報刊，到 1936 年日本侵華計劃達到高潮時，都一律被禁刊了，教中文的書房、義塾也全被封閉。但民族精神是壓抑不了的，不信，且看臺灣人民一直在使用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很多詩社都在繼續活動，很多不公開的書房、義塾也依舊在維持著，各地仍存在有南管、北管等音樂團體，甚至酒館的藝妓也仍在唱著中國歌曲，她們並且表示賣藝不賣身，不願被日本人污辱。極少數賺日本人錢的，都被稱為『番仔雞』；極少數嫁給日本人為妻的，都

⁵ 同上書，頁 73。

⁶ 同上書，頁 32。

被稱爲『番仔酒斫』，爲人所輕視不齒，在臺灣是沒有立足之地的。」⁷楊肇嘉回憶他自己年輕時赴日本留學，正逢東京籌備舉辦大正博覽會，他請友人協助在「中日交通會」謀得爲赴東京訪問的中國官員擔任嚮導之兼職。楊肇嘉在工作期間認識許多參觀博覽會的有地位的中國觀眾，由於同情他的處境，給了他不少接濟，勸他找機會到中國大陸去走一趟，說：「祖國正需要像你這樣的臺灣青年去工作，去參加國家建設。」這些話給楊肇嘉留下極深印象，使楊肇嘉的民族意識油然而生。⁸日據時代曾因反抗日本被捕入獄的鍾逸人，也回憶他在獄中所遇到的難友的心情，他說：「當我獲知他是中國人時，一種同胞愛和憐憫之心便油然而生。對常帶他出去『修理』和拷問的那個『特高』的憤恨尤其使我久久不能平復。」⁹諸如此類的例子甚多，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的「祖國意識」多半是由日本殖民統治所激發。

(2) 形成日據時代臺灣人的「祖國意識」的第二個因素是由於對漢文化的認同。吳濁流的話很能說明這種起於文化認同的「祖國意識」：¹⁰

⁷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一）》（臺北：三民書局，1977），頁4。

⁸ 同上書，頁100-101。

⁹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頁37。

¹⁰ 同上註3。

臺灣人具有這樣熾烈的鄉土愛，同時對祖國的愛也是一樣的。思慕祖國，懷念著祖國的愛國心情，任何人都有。但是，臺灣人的祖國愛，所愛的決不是清朝。清朝是滿洲人的國，不是漢人的國，甲午戰爭是滿洲人和日本作戰遭到失敗，並不是漢人的戰敗。臺灣即使一時被日本所佔有，總有一天會收復回來。漢民族一定會復興起來建設自己的國家。老人們即使在夢中也堅信總有一天漢軍會來解救臺灣的。臺灣人的心底，存在著「漢」這個美麗而又偉大的祖國。

吳濁流曾將這種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祖國意識」比擬為孤兒對父母的情感。¹¹吳濁流回憶他的一生經歷說：「當時的抗日戰爭，是自發的，而不是有組織，有系統的，既沒有橫的連絡，也沒有縱的系統。更不是受人宣傳，煽動而蜂起的。臺灣人在無意識中，認為臺灣是自己的祖先所開拓的，我們做子孫的，有保護它的義務。我們的祖先，經過無數的艱難辛苦與努力建設起來的村莊，每一寸土上都有祖先流下的汗、血與淚。爲了保衛村莊，與瘴癘、番人或外敵搏鬥而犧牲的也不少。現在奉祀在義民廟的神靈，都是爲村莊而戰死的英雄。把這些英雄的神靈稱做義民爺，尊稱他們如同自己的父執。爲了祭祀這些英靈，臺灣人每年花費莫大的金錢，舉行盛大祭典。這義民廟的精神，在不知不覺中灌流在臺灣人的血液中。保衛自己的

¹¹ 吳濁流：《無花果》，頁 40。

村莊是自己的義務，這種觀念，不知何時，在無意識中，已混入血液中。具有這種精神，一旦有了外敵，自然就要顯露出來。因此，聽到有日軍來臨，便湧起抗日的感情，產生抗日的思想，變成抗日的行動，自動地馳赴抗日戰線參加抗戰。〔…〕臺灣人具有這樣熾烈的鄉土愛，同時對祖國的愛也是一樣的。思慕祖國，懷念著祖國的愛國心情，任何人都有。但是，臺灣人的祖國愛，所愛的決不是清朝。〔…〕臺灣人的心底，存在著『漢』這個美麗而又偉大的祖國。」¹²吳濁流所說的臺灣人的「祖國愛」的對象是歷史上的「漢族」而不是清朝，這種「祖國愛」隱涵著理想與現實的撕裂，甚至是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矛盾。

三、日據時代臺灣人「祖國意識」的內涵及其問題

那麼，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臺灣知識份子的「祖國意識」的思想內涵如何呢？（1）一言以蔽之，這種潛藏在當時臺灣知識份子心靈深處的「祖國意識」的具體內容是：將臺灣與中國大陸視為有機的而不是機械的關係，認為中國大陸是臺灣的文化母根。（2）但是，這種「祖國意識」的思想內涵是一種抽象的心理的建構，而不是具體的現實的存在；（3）所以，一旦

¹² 同上書，頁 38-40。

臺灣人在「祖國意識」驅使之下，前往中國大陸，就會深刻感受到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或衝突，使他們對原鄉悵然若失，甚至為之夢碎。這一節的任務就是在於引用史料論證以上這三項主要論點。

(1) 日據時代臺灣人多半認為臺灣與大陸的命運是一種有機的整體關係，較能具體說明這種意識的是 1925 年臺灣學生在北京發生的一段史實。1925 年 3 月 14 日孫中山先生逝世，段祺瑞召開善後會議，擬承認與各國所訂條約，當出身臺中太平庄的林姓人士花錢獲得臺灣代表的資格之後，在北平的臺灣學生在北京大學召開會議，以楊肇嘉為主席，議決勸阻林某出席段祺瑞的會議。後來楊肇嘉在暗巷中被刺客所刺，在住院期間對前來訊問案情的日本警察說，只要林某不出席段祺瑞的會議，則他就同意不提訴訟。後來林某果然未出席。楊肇嘉回憶當時臺灣學生的想法說：¹³

〔…〕北平臺灣學生主張把臺灣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連在一起，依靠祖國以收復臺灣，認為參加祖國的建國工作，才是救援臺灣之道的見解，卻頗正確，因此除了學文的以外，也有轉而學武的，像蘇紹文、王民寧幾位從北大轉業的臺灣軍人，也在祖國的抗日軍事上表現過相當的貢獻。

¹³ 楊肇嘉：前引書，頁 65。

這種想法主張解放臺灣的正途是建設一個富強的中國。

這種認為臺灣與中國大陸休戚與共的「祖國意識」是以文化認同為其根本基礎的。這種文化認同源遠流長，是明清以來移民臺灣的人的共識，日據初期臺灣富豪李春生（1838-1924）在日本佔領臺灣之前一年（1984）在他的《主津新集》中就明白地表示這種文化認同，李春生說：「但生同中國，念切父母墳墓，無奈冒死以天道爭。」¹⁴又說：「僕忝生諸夏，素欣中華，世稱聲名文物之地，人知禮義，仕達經權，固有修身齊家、為國衛民之教，惟是於天道之缺，關繫匪輕，想能探源問津，敬謹恭納，以膺天眷。孰意是教，自入中原以來，為日已久，吾人不但置若無聞，且多方譏謗，百計窘逐，倒樹諸佛旗幟，勁敵帝天真理，是誠何心哉？」¹⁵李春生雖信仰外來的基督教，但他「生同中國」「素欣中華」，對中華文化心嚮往之。

就是這種文化認同，使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在中國大陸旅行時，常有「血濃於水」的情感的激動。葉榮鐘回憶他在中國東北安東市的街道上，聽到一位殘障人自拉自唱京曲，聲調蒼涼哀淒，但態度自然沈穩，他描述當時的心境說：¹⁶

我完全被他吸住了，京調我一竅不通，好壞無法判斷，但是內心卻會發出熱烈的共鳴。這是什麼作用我也不知

¹⁴ 李春生：《主津新集》（福州：美華書局，1984），卷一，頁71。

¹⁵ 同上書，卷二，頁7。

¹⁶ 葉榮鐘：《小屋大車集》（臺中：中央書局，1977），頁26-27。

道，只是感激，只是嚮往，只差沒有掉下眼淚而已。當時我也沒有餘裕去反省自己這樣的反應是為什麼，其實這是並不是價值判斷的問題，也不是思想理想的問題。勉強來講或者可以說是「血」的共鳴？

葉榮鐘所說的「血的共鳴」，很傳神地刻劃了一個臺灣人初抵大陸的心情，這是以對漢文化的認同作為基礎的。也正是這種文化認同，使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臺灣人欣喜若狂，認為華夏衣冠重見天日。1947 年 7 月 31 日，吳新榮在光復的氣氛下為他的家族撰寫「祖譜」，並「燒香奉花以報告於祖先的靈前」，¹⁷甚至為他的第五個男孩命名為「夏統」，取其大夏一統之意。¹⁸

以對漢文化的認同作為基礎，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從不認為臺灣與中國是機械性的對抗的關係，所以在抗戰期間吳新榮在 1940 年 4 月 10 日寫下這樣的日記：「有餘暇便讀書，希望將來達成三大願望：第一、住宅的建造，第二、子弟的教育，第三、環遊世界。這是我一生的使命，也是目標。最後希望埋骨於大陸，為達成此理想，該有實際行動。」¹⁹歸骨於大陸，竟是中日戰火方熾，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身處臺灣南部的知識份子吳新榮的願望。甚至到了戰後的 1950 年 6 月 29 日，吳新榮也在日記中擔心：「深恐臺灣將來的運命，對祖國有嚴重的影

¹⁷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戰後）》，頁 30。

¹⁸ 同上書，頁 20。

響，我們永久主張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也是中國人的臺灣了，爲此主張我願意犧牲我一生。」²⁰這種將臺灣與大陸視爲不可分割，休戚與共的想法，在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間相當普遍，成爲當時臺灣人的「祖國意識」的核心觀念。

(2) 但是，必須立刻指出的是，日據時代臺灣人這種「祖國意識」是一種抽象的心理上的建構，缺乏具體的現實作爲支撐基礎。正如葉榮鐘所說，這種「祖國意識」是由「歷史文字而構成的」²¹；吳濁流所說的是一種「眼不能見的祖國愛〔…〕一種近似本能的感情」；²²鍾理和（1915-1960）聽到友人吳劍秋講述抗戰期間在大陸淪陷區買鹽的遭遇時，使他深爲震撼的「中國人的感情」。²³這種「祖國意識」是感情多於理性的，是抽象而不是實體的建構。

(3) 正因爲日據時代臺灣人的「祖國」形象是一種歷史的不是現實的，是一種理想的而不是實際的，所以當他們初抵大陸，立刻就發現他們理想中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之間存有巨大的差距。吳濁流的親身經驗相當具有代表性：²⁴

¹⁹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戰前）》，頁 91。

²⁰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戰後）》，頁 51。

²¹ 同上註 2。

²² 同上註 3。

²³ 張良澤編：《鍾理和日記》，收入：《鍾理和全集》（臺北：遠行出版社，1976），頁 60。

²⁴ 吳濁流：《無花果》，頁 120-123。

登陸後，我發覺到一句話也聽不懂。雖是自己的祖國，但予人感受卻完全是外國。〔…〕往南京的火車，擠得實在可怕。乘客排成長蛇陣，在接受煩瑣的檢查。我是日本籍，所以在另一個檢查處，亮出護照即放行，東西也沒有檢查。上海站被炸毀，僅有臨時蓋的房舍。鐵路是寬軌，車廂比臺灣的寬大，乘客們個個攜帶大量包袱，沒有行李的非常罕見。沿途所有車站也都是隨時站房，顯示往日的激戰，所見皆荒涼，比上海的繁華恍同隔世，上海儼然是列強榨取的中樞，很多銀行、會社等高樓大廈，建築的豪華令人吃驚，而住在租界的外國人，其妄自尊大，其旁若無人，更令人憤慨。只不過三四天的見聞就使我深感做一個中國人的悲慘。洪水般的野雞，乞丐的奔流，都是為求生存的人們的可憐影子。相反地，外國人都是暴君，橫蠻不可理喻，正是支配者的一副嘴臉。

臺灣人的原鄉夢本來是一種美好的憧憬，可是在踏上祖國土地的時刻，換來的卻是不可置信的「做一個中國人的悲慘」，在情緒上受到強烈的撞擊，因為原鄉的美好草原，竟然蘊涵著人性的墮落，到底是戰爭的無情摧殘人性？抑或是古老帝國的殘渣隨江河以俱下的結果？吳濁流模糊了，他情感上交雜著無奈、悲哀與傷感。

吳濁流所感受到的「理想中國」與「現實中國」之間的巨大差距，正是大多數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的共同經驗。出身

高雄望族的彭明敏曾回憶他五歲的時候隨父母遊上海與南京等地，他說：「這次旅遊卻給父母一個機會，將大陸中國人與被日人統治了幾十年的臺灣人的生活情況，作一比較。當然，他們對中國的廣大，印象深刻，對祖先的土地，也感到有些鄉愁。不過，就社會發展、工業化、教育和公共衛生方面來說，他們覺得比起臺灣，中國還有許多有待改善的。」²⁵

日據時代的臺灣與當時中國大陸的對比是如此地鮮明，使初抵大陸的臺灣人不免自問：「這就是祖國嗎？」。出身於鹿港的葉榮鐘在抗戰時初抵東北時，就有這樣的感慨：²⁶

〔…〕安東市街相當殷盛，店舖櫛比，只是沒有像臺灣有亭子間，店舖的門面和招牌與三十年前在故鄉鹿港見到的相彷彿。我內心自問這就是祖國嗎？行行重行行，並未發現一件能夠使我多年憧憬的心情得到慰釋。這種古老市容，我童年時代已經司空見慣，一點都不稀罕，馬路上熙來攘往，就有不少的日本人，日本人和白俄經營的商店，也很多滲雜其間。這是祖國嗎？我自問自答，只有搖頭，沒有肯定。老實說，我自己也沒有一個具體影像，可以來衡量這樣才是祖國標準。但是我內心對眼前的光景發生抵抗則是事實，這真使我嗒然若喪。

「這就是祖國嗎？」這個巨大的問題，正是「理想」與「現

²⁵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 28-29。

²⁶ 葉榮鐘：前引書，頁 26-27。

實」的對比下，在熱愛「祖國」的臺灣知識份子心目中所逼出來的問題。

不僅葉榮鐘所見東北大城安東市給他留下這樣的問號，出身臺南而在抗戰時任職「滿州國」中央銀行，光復後曾出任彰化商業銀行董事長的吳金川(1905-?)，曾到過在蔣經國主政下新生活運動推動得如火如荼的江西南昌，他看到的南昌充滿了虛假，吳金川回憶說：²⁷

我在南昌時，下榻飛行員住的旅館，算是當地最好的旅館。住進去以後，我發現我的行李早已被搜翻過了。沒多久，就有一位拿著明治大學學士名片的年輕人來迎接我，並且自告奮勇要帶我到處去參觀。其實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可以看的方才帶我去參觀，不可以看的方我不能去看。」和今天大陸一樣。當天中午，我先請那位先生吃飯，吃過飯後表示我要休息，請他回去。待他離開後，我才私自一個人出去遊歷，到他沒帶我去過的地方走走。我一看，才發現可參觀和不可參觀的地方，大概相差十年的水準。所以我才知道所謂新生活運動只是表面工作，並不澈底，表面上市街維持新生活要求的水準，離開市區，則不堪目睹。

表裡不一、虛偽作假正是日據時代臺灣人所看到的「真實的」

²⁷ 〈吳金川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五）——日據時代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130。

中國大陸的實況。臺灣人的原鄉夢碎，是可以想見的自然結果。

四、臺灣知識份子「祖國意識」的轉變：

「忍辱包羞五十年，今朝光復轉淒然」

上文所說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祖國意識」，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臺灣光復以前，由於去過大陸的人就整體臺灣人而言只佔少數，所以，存在於臺灣人「祖國意識」中的「理想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之間的差距，尚未全面爆發。但是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臺灣光復之後，光復前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熾熱的「祖國意識」，立即面臨嚴酷的現實的打擊。「忍辱包羞五十年，今朝光復轉淒然」²⁸，葉榮鐘這首詩正是這種轉變的最佳寫照。為了對這種「祖國意識」轉變的過程有所掌握，本節（1）將首先描述 1945 年臺灣光復時臺灣知識份子對回歸「祖國」的歡欣心態；（2）接著再分析由於（a）接收後國府人員的腐敗以及（b）國府對臺灣人的歧視與差別待遇，使臺灣人光復後成為「二等國民」，造成臺灣人「祖國意識」快速質變，終至疏離。（3）而在光復後臺灣人對以國府為具體代表的「祖國」的不滿，更是在對臺灣「戰犯」的解釋上透露無遺。我們引用史料闡述這三項論點。

²⁸ 這是臺灣光復時，葉榮鐘所賦「八月十五日」七言律詩的前二句。見：《小屋大車集》，頁 212。

(1) 1945年8月15日臺灣光復，這在當時臺灣人心中是一個霹靂天驚的大事。臺灣人人心振奮，莫不以爲此後是「喜離淒風苦雨景，快睹青天白日旗」，吳三連這時滯留在天津的合豐行，傾聽日本投降的廣播，興奮莫名，他這樣表達他的期待：²⁹

做爲一個抗日運動份子，我對勝利自有一番幻想。我第一幻想是，快快回到臺灣，親眼看到日本國旗從臺灣總督府降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冉冉升起；第二幻想是，那些一向跋扈欺凌我臺灣同胞的日本人應向臺灣人懺悔道歉，尤其像1936年在臺中州知事始政紀念日酒會上，只因為林獻堂曾經認中國爲祖國，便出手掌摑的那種日本人，一定要向臺灣人道歉；第三個幻想是，日本人敗走後，有效結合全體臺灣人才以建設臺灣。

在大陸的吳三連對臺灣光復欣喜若狂，當時對未來的建設有許多他自己說的「幻想」；在臺灣的鍾逸人對於8月15日那天他初次看到青天白日旗，更有極爲動人的描述：³⁰

我終於看到渴望許久，在內心深處隱藏許久的祖國的標誌——中國國旗。我站在鐘錶店人行道上，一個人悄悄抬頭凝視那面旗子許久，終於忍不住內心的興奮，便開

²⁹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臺北：自立報系，1991），頁102-103。

³⁰ 鍾逸人：前引書，頁277-278。

口以北京官話問剛從店裡走出來的老翁：「這個旗子是你們的？賣給我好不好？」他點點頭表示「可以給我」，並以略帶濃重福州腔調說：「十塊錢」。我隨即掏出一張五十塊錢的鈔票給他。他要找我四十塊錢，我搖搖頭表示：「不必」，轉身正欲離開的時候，那位福州老兄卻彎著腰頻頻向我鞠躬行大禮。

這樣一位心向「祖國」的青年鍾逸人，在 1945 年 12 月初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第一期幹部講習會」，渴望實踐理想，但是 1947 年二二八事變之後，竟成爲二七部隊的部隊長，率兵與國府軍隊作戰。鍾逸人的「祖國意識」的轉變，絕不是當時臺灣人的特例。但是，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呢？

(2) 光復後臺灣人的「祖國意識」的幻滅，最直接的因素大概是由於來臺辦理接收的國府人員的腐化，幾乎所有歷史見證者所留下來的資料，都一致肯定這一點。在數量龐大的見證史料中，吳三連的證辭很有代表性，吳三連說：³¹

鉅變的另一個面貌是，臺灣人對中國同胞的熱切感情，迅即被接收人員的腐敗言行破壞殆盡。在華北、在臺灣，情形沒有兩樣。許多接收人員要金子、要銀子、要車子、要房子、要女子，人們稱爲「五子登科」。〔…〕

³¹ 吳三連：前引書，頁 107-108。

民國三十五年，我曾返回臺灣，停留了兩、三天，所到之處，耳朵聽的都是對接收人員的不滿言詞，不禁感到無比的失望。剛剛才為光復而歡欣鼓舞的同胞，貪污的敗行無異醍醐灌頂。返回天津後，我告訴同鄉，臺灣的情形好比一個石油庫，只要一根火柴，全臺就會引爆。果不其然，過了沒多久，悲慘的二二八事變就發生了。

臺灣光復後來臺灣的國府人員的腐敗，普遍激起臺灣人的反感。出身嘉義朴子，肄業日本戰車兵學校，並曾赴大陸河南一帶與國軍作戰的陳正添，對光復後的臺灣有這樣的觀察：「自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府撤退來臺，治理臺灣之後，所謂『回扣』、『前金、後謝』、『紅包』等金錢文化開始盛行於各地。近幾年來，槍、毒、搶劫等現象則愈來愈多，社會治安日趨惡化，賭博風氣盛行，社會秩序敗壞，國民道德淪喪，已至非常嚴重的地步，這情況實在令人憂心。」³² 陳正添的觀察正是當時絕大多數臺灣人共同的感受。鍾逸人對當時國府接收人員的表現就說：「他們這些人來到臺灣，一股腦兒就只想如何『劫收』日人財產，如何接收蓬萊閣、江山樓的藝旦，卻不認總理，不問三民主義之爲何物。可嘆！可悲！」³³

國府接收人員的腐敗，使臺灣人的「祖國意識」從現實中覺醒，而對陳儀等人能否代表「祖國」產生深沈的困惑。葉榮

³² 〈陳正添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五）——日據時代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 85。

鐘將這種困惑表達得最清楚，他說：「我們衷心的喜悅是脫離日本的桎梏而復歸祖國的懷抱，也就是歡迎祖國來統治，若寫歡迎祖國又覺空洞不切實際。國民政府是中華民國唯一的合法政府，所以我們歡迎國民政府就是歡迎整個祖國的意思。也唯有歡迎整個祖國，重入祖國版圖，我們才能夠摸到由光復得來的歡喜的實體。〔…〕有人說陳儀長官在法理上代表國民政府，而國府又是祖國的代表，那末歡迎陳儀長官不是就等於歡迎祖國嗎？這樣的三段論法當然可以成立。但這並不是邏輯的問題，這一股熱情所祈求的是血的歸流，是五千年的歷史和文化的歸宗，陳儀不配做我們傾注情感的對象。」³⁴光復後，臺灣人的「祖國意識」由於欠缺具體的「人」加以落實，終於只能走上幻滅一途。

除了光復時來臺接收的國府軍政人員的腐化，引起臺灣人對「祖國」的幻滅這項因素之外，光復後臺灣人受到國府的歧視，也是另一項重要的因素。光復後，外省軍政人員取代日據時代日本人的統治地位，臺灣人深感受到壓迫。吳濁流回憶光復初期狀況說：³⁵

〔…〕政府和黨都完全不信任臺灣人。與日本時代一樣，政府機關的上層部分，由外省人取代了日本人，而臺灣人依然是龍套角色。熟悉實情的本省人在下，完全

³³ 鍾逸人：前引書，頁 322。

³⁴ 葉榮鐘：前引書，頁 212-213。

不懂狀況的外省人在上，政府怎麼可能順利推動呢？加上外省人比日本人更官僚化，又有一份優越感，自然弄得一團糟。貪污是家常便飯。多數只能為私利私益著想，國家利益根本不當回事，因而接收工作紛爭迭起，又因濫發紙幣，通貨日日膨脹，物價飛騰。十二月二十四日，來自臺南的消息說，白米一斗終於衝破一百元大關。於是責難之聲四起，終於以「豬」來稱外省人了。而那些「半山」（前往大陸回來的臺灣人）裡的重慶歸客中未受登用的，便也利用這個機會，為了發洩心中不滿，也大肆攻訐。湊巧的是黨部與政府間也不能融洽，經常言論相左，形成人心莫衷一是的情形。

這種以少數外省腐敗政客為主體的國府當局，加深了臺灣人對「祖國」的疏離感。

其實，這種疏離感早在日據時代就在去過大陸的臺灣知識份子心中醞釀發酵，形成吳濁流所說的「亞細亞的孤兒」情結。臺南人許顯耀曾就讀浙江大學工學院預科，他回憶他在大陸讀書時，就碰到一些大陸人根本不知道臺灣位在何處，只是個海外小島，所以大部份的人就直覺認為臺灣人是化外之民，大陸同學為許顯耀取了一個「生番」的外號，很能反映他們對臺灣的看法與心態。³⁶大陸人將從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來的臺灣人

³⁵ 吳濁流：《臺灣連翹》（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頁185。

³⁶ 〈許顯耀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六）——日據時代臺灣人赴大陸

視為「二等國民」³⁷的心態，使臺灣人既受日本人欺壓又受到「祖國同胞」的歧視，他們抱憾終天，埋憂無地。吳濁流敘述他的大陸經驗說：³⁸

在大陸，一般地都以「番薯仔」代替臺灣人。要之，臺灣人總被目為日本人的間諜，不管重慶那邊或和平陣容這邊都沒有好感。那是可悲的存在。這原因，泰半是由於戰前，日本人把不少臺灣的流氓遭到廈門，教他們經營賭場和鴉片窟，以治外法權包庇他們，供為己用。結果祖國的人士皂白不分，提到臺灣人就目為走狗。這也是日本人的離間政策之一。開戰後日本人再也不信任臺灣人，只是利用而已。臺灣人之中有不少是抗戰份子，為祖國而效命，經常都受著日本官憲監視。來到大陸，我這才明白了臺灣人所處立場是複雜的。

吳濁流的親身經驗是當時臺灣人普遍的困境，澎湖人李佛續抗戰時期畢業於南京的私立金陵大學電機系，他在大陸求學時為了避免無謂的誤會，都不說自己是臺灣人，而改說是福建閩南人或廣東客家人，因為臺灣當時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為了避免抗日情緒的波及，所以一向都對外自稱是福建晉江人，在大學登記的籍貫也是福建晉江。³⁹戰爭末期在海南島的

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90。

³⁷ 同上書，頁43。

³⁸ 吳濁流：《無花果》，頁125。

³⁹ 〈李佛續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六）——日據時代臺灣人赴大陸

黃順鏗也回憶在日本投降以後，接收海南島的國府軍團部的人，罵臺灣人是「喪家之犬」。⁴⁰臺灣人對「祖國」的感情由熱切轉為冷淡以至疏離，是有其具體的歷史背景的。

在以上這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日據時代臺灣人熾熱的「祖國意識」終於轉趨冷淡，以至萌生不滿。

（3）光復初期臺灣人對國府的不滿情緒表現在所謂臺灣「戰犯」的解釋之上。

國府對日抗戰勝利後，將當時在大陸的許多臺灣人指為漢奸或戰犯，許多臺灣人甚不以為然，例如當時在大陸經商吳三連就認為：「當年滿清中國把臺灣割讓給日本，原非臺人所願，所以反抗行動前仆後繼，只因為沒有武器所以不得不聽任日本人宰割。臺灣既為日本人所有，則臺胞為求生存，在高壓統治下，沒有選擇。既然臺灣人變成日本國民並非臺人的責任，則漢奸指控，應有商榷餘地。」⁴¹清代名將藍鼎元（1680-1733）的第九代孫女藍敏（1921-）更說：⁴²

對於戰犯這個名詞我非常反感，主張臺灣沒有戰犯。因為臺灣在甲午戰後割予日本，是政府不要這塊土地，不

經驗》，頁 56。

⁴⁰ 〈黃順鏗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六）——日據時代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 143。

⁴¹ 吳三連：前引書，頁 104-105。

⁴²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93。

要這些子民，而非這些子民不要父母；子女長大後，養父母和生父母打仗，生父母打贏了，就說是臺灣子民幫養父母打人，便要將之抓起來關，這是沒有道理的。所以我在南京時，逢人便講這個道理，剛開始都沒人理我，我曾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門前站了好幾個小時，大家一聽到戰犯都怕得要命，好像躲癩瘋病似的不敢接近我們。後來經我不斷地陳述，而且時間一久，他們也不那麼急著抓人…，這樣約莫過了一年八個月，臺灣戰犯這個名詞才全部取消。

國府政權與臺灣人對臺灣「戰犯」的看法南轅北轍，這是光復之後臺灣人的不滿的重要核心問題。

五·結語

本文運用回憶錄及口述歷史記錄等資料，探討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的「祖國意識」的形成、內涵及其轉變。根據我們的分析，日據時代許多臺籍知識份子將中國大陸視為他們的「祖國」，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日本殖民政策的壓迫所激起的，另一方面是臺灣的漢人在日據時代有相當強烈的漢文化認同，他們將大陸視為文化及歷史的「原鄉」。這種「祖國意識」將臺灣與中國大陸視為有機的文化整體，而不是機械的對抗的敵體。但是，這種「祖國意識」本質上是一種抽象的心理建構，缺乏具體性與現實性，所以日據時代的臺灣知識份子懷

抱對「祖國」高度的理想的期待回歸大陸時，立即感受到「理想的祖國」與「現實的大陸」之間的巨大差距，而使美好的憧憬灰飛煙滅。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臺灣光復以後，臺灣正式回歸「祖國」，全面的接觸使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及其引起的不滿，完全爆發，尤其具體表現在臺灣人對於一些臺灣同胞被視為「戰犯」之不滿，到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祖國意識」可謂隨風而逝了。

從本文對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的「祖國意識」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提出兩項結論性的看法：第一，存在於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精神世界裡的「祖國意識」，基本上是一種「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祖國」在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心目中是一種歷史的共業，這種共業以對漢文化的認同為其基礎。這種「集體記憶」是由當代人(尤其是日本人的殖民與壓迫)所建構的。而且，正如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所說，⁴³「集體記憶」中的記憶者是作為群體的一份子的個人進行記憶，而不是一個與群體無關的個體在進行記憶。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是在臺灣人群體的脈絡之中將「祖國」的歷史與文化當作「集體記憶」，而成為他們文化認同的一部分。

第二，從本文的研究可以發現：人並不是一種抽象的存在，人活在具體而特殊的時空脈絡之中，必然受到時空因素所

⁴³ 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ry Douglas (New York: Harper-Colophon Books, 1950), p. 48.

產生的錯綜複雜作用之制約。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飽受日本人壓迫，使他們淵源於明清時代的「祖國意識」快速成長；但是光復後國府的腐敗與歧視，又使他們的「祖國意識」轉化乃至消逝。從這一點來看，在孕育臺灣人的「祖國意識」的諸多因素之中，「政治權力結構」是最根本的因素。不平衡的權力結構使臺灣人在日據時代快速形成「祖國意識」；也正是不平衡的權力結構，使戰後臺灣人的「祖國意識」為之淡化。（1996年11月21日初稿，曾發表於《第五屆高雄文化發展史學術研討會》，1996年12月7日，高雄市。）